

# 中国的改革开放 与科学社会主义共命运

侯惠勤

—

《共产党宣言》发表 160 周年了。160 年来的历史跌宕起伏、错综复杂，但是由《宣言》所开创的科学社会主义运动，无疑是这段历史的主旋律。在对待《共产党宣言》及其奠定的整个科学社会主义，有两种基本立场。一是如马克思恩格斯在 1872 年德文版序言指出的：“不管最近 25 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某些地方本来可以作一些修改。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所以第二章末尾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根本没有特别的意义。如果是在今天，这一段在许多方面都会有不同的写法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248-249 页）这是全世界马克思主义者、当然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立场。另一是从根本上否定《共产党宣言》所奠定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把它归结为不成熟历史条件下的一种浪漫主义情绪，是一种根本错误的历史观。这是全世界资本主义卫道士的立场。对于他们而言，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早已被逐出了历史舞台。狂妄地视自由主义的政治构架为不可超越的“历史的终结”的弗兰西斯·福山声称：“共产主义对自由构成的威胁是如此直接和明确，其学说如今这样的不得人心，以至于我们只能认为它已经被完全赶出发达世界。”（《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第 334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年）但

是，正如列宁指出的：“他们曾经一百次、一千次地宣告唯物主义已被驳倒，可是直到现在，他们还在一百零一次、一千零一次地继续驳斥它。”（《列宁选集》第 2 卷第 16 页）

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苏东解体”以来，在西方乃至世界，确实几乎已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即不管你是否喜欢资本主义，可你必须得接受它；不管目前和未来还有多少思潮在碰撞、在挑战现实，可最终还是无法逾越自由民主的制度架构；也就是说，你可以批判它，却无法取代它。齐泽克是这样描述的：“正如弗雷德里克·詹明信（Fredric Jameson）极具洞察力地论及的那样，再也没有人严肃认真地考虑可能用什么来取代资本主义了，就好像即使在全球性生态灾难的境况下，自由资本主义也仍然是一个注定存在下去的‘实在’。”（《图绘意识形态》第 1 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年）乐观也罢，悲观也罢，资本主义不可超越，这就是一个时期以来西方哪怕是左翼思想界也无法摆脱的一种普遍情绪。

但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旗帜的当代中国，迅速而持续地发展壮大，从根本上改变了上述历史格局，使得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具有了历史讽刺意义。在 1997 年，即将步入 21 世纪的中国，就通过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向世界宣告，“旗帜问题至关重要。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并通过确立邓小平理论的指导地位，更高地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2007 年，处于新世纪、新阶段、新起点的中国，通过中国共产

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进一步深刻总结了以改革开放为主要特征的新时期的历史经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这是扎根于实践沃土的鲜活经验，它生动地证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可分割，实现这一伟业的关键在中国共产党，而“思想理论建设是党的根本建设，党的理论创新引领各方面创新”。从更广阔的背景来看，这实际上通过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经验和理论创新，已经为近半个世纪以来扑朔迷离的意识形态之争，给出了一个明确的答案：主义仍然是凝聚共识、形成合力的主导力量；理论及共同理想所激发出的政治热情、参与共同体生活的积极性仍然是不可替代的有效方式；历史并没有终结，社会主义仍然是当代人类发展的共同追求。

现在的问题在于，各种敌对势力一直试图把中国的改革开放与其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的图谋捆绑在一起，以便从社会存在和社会认同两方面颠覆中国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性质。今天我国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就在于，如何把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充分有效地转化为对于社会主义的认同。我们思想理论工作一个着力点，就是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为依据，充分阐明中国的改革开放与科学社会主义共命运，“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

## 二

就理论上而言，西方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为了从根本上割断中国的改革开放与科学社会主义的联系，抛出了许多颇具迷惑性的说法，其中最为典型的的就是“一个假设”、“打破三个幻想”。

所谓“一个假设”就是关于“经济增长的阶段”假设，认为现代化的过程是一个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必须经历不同经济增长阶段的客观过程，而与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选择无关。用“经济增长的阶段”做出“非共产党宣言”表态的W.W.罗斯托就明确提出：马克思的“整个体系在1848年他和恩格斯起草《共产党宣言》时已经完全

形成，这就是说，是在除英国外没有任何其他社会起飞阶段的时候形成的。”“简言之，马克思属于西方这样一类人物，这一类人以不同的方式反对走向成熟阶段中所发生的社会和人类成本，寻求使社会保持更好和更合乎人道的平衡。”（《经济增长的阶段》第165-16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在他看来，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整个指控，建立在个别国家（英国）刚进入经济起飞阶段时出现的不平等现象的片面把握之上，因而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

在这方面，西方意识形态制造的一个神话，就是这种不平等与资本主义所制造的剥削无关，而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必然现象。达仁道夫下述观点就是对这一神话的描述：“现代精神的历史从根本上讲是供给不断增长的历史。……沃尔特·罗斯托汇集了自1700年以来世界工业生产和世界贸易的整个指数，尽管他搜集的数据中不可靠的数据可能要多于体现整个指数的准确所需要的数目。但是，他的工作所提供的画面是十分明确的，以至于其结论是无可怀疑的。……事实上，这是增长似乎能回答一切问题的时代。增长不仅是一种普遍的信条，而且也是扎根于个人和机构的思想的出发点。”“在现代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财富分配里的不平等起初在拉大，随后出现拉平的效果，后来事情的发展就颠倒了过来。……贝格尔认为，发生这种过程的两个主要原因在于技术和人口，而不是社会和政治原因，虽然在增长和不平等的三个阶段中的第二阶段里，政治干预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会强化拉平不平等差距的过程。”（《现代社会冲突》第126-12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

当代中国的理论工作者，必须结合新的历史条件，对于革命和发展的关系进行创新研究。其实，在马克思那里，无产阶级革命从来就不是一种破坏性的力量，而是一种建设性的力量；革命不仅催生了新社会，而且也是推动新社会前进的力量；无论革命还是建设，都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把我国的改革开放称为共产党领导的第二次革命。尽管两种革命的性质、任务不同，但其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作用是相同的，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在其中的领导作用是相同的。把革命和发展对立起来，通过“妖魔化”革命把改革发展引向“全盘西化”的邪路，是值得注意的动向。

所谓“打破三个幻想”，就是在他们看来支撑着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三大支柱性观点，即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观点，都是一种虚幻的乌托邦，浸透着空想的激情，但是没有任何现实根据。

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可能发生暴力革命的预言，是马克思主义中最具伤害性的因素，”因为历史不仅使这一预言一再落空，而且“一场除摧毁专制之外还试图尝试达到别的目的的革命，正如它可能达到自己现实的目的一样，至少可能造成另一种专制。”（K.R.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2卷第240-24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他们认为，其所以如此，是因为革命不是建立在对现实社会的正确认识上，而是以黑格尔概念辩证法为基础的历史决定论的产物，这是支撑着马克思幻想的柱石。“波普尔传达的信息很简单，但却是深奥的。我们生活在一个带有不确定性的世界里；我们尝试着新的东西，而且我们也会犯错误。谁也不能确切知道，哪一条道路会引向前方，而那些自以为拥有这种知识的人也会犯错误。这种不确定性是难以忍受的。贯穿整个历史，对确定性的梦想一直陪伴着带有不确定性的现实。伟大的哲学家们为这种梦想推波助澜。柏拉图描绘了由哲学王治理的国家的景象，在那里，知道真理的人有发言权。黑格尔和在他之后的马克思，要求代表历史讲话，他们认为，合理的东西要么是现实的，要么在无产阶级革命之后变为现实。但是，这是一些错误的预言家。”（《现代社会冲突》第115页）我们今天的又一任务，就是要充分阐明认识历史规律在何种意义上是可能的，充分阐明历史辩证法的科学性。

西方意识形态认为，支撑着马克思主义幻想的另一柱石，就在于一个神化了的工人阶级和一个神化了的工人阶级政党。因此他们不遗余力地渲染工人阶级及其政党没有任何特殊性。“革命的幻想把对进步的不可阻挡的进军的信仰与乌托邦的海市蜃楼结合起来。它引诱人们脱离现实的世界，因而在实际上——如果不是有意的话——引导人们离开自由。对于很多人来说，怀抱这种奢望的关键就在于‘无产阶级’这个概念。马克思绝不是惟一的一个执着于这种信念的人，不过，很多人以为找到了一条从现实径直通往乌托邦的道路，他首先对此是负

有责任的。”“与虚构的猜测相反，工人们与其说是胸襟宽大的，毋宁说是不宽容的，与其说是国际主义的，不如说是民族主义的，对待自由党人与其说是热爱自由的和开放的，不如说是批判的和寻求保护的。”（同上，第101页）因此，马克思“所指出的主要动因并没有获得预期的发展；他指望这支力量发挥的作用并没有成为事实。预定会推动这支力量起作用和发展的趋势一般并没有出现，即使是偶然地和部分地出现了，也并没有带来他所预期的后果”（米尔斯，《马克思主义者》，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34页）。

西方意识形态还认为，不但工人阶级如此，“随着人们对工人阶级的真正的意见和态度产生失望，接踵而至的是人们对工人运动组织的幻想的更大程度的破灭。”“米歇尔深刻钻研了人的本质和社会的要求，来说明这样一种简单的观察：一个政党就是一个政党。……无论如何，他得出结论，认为工人运动已经变成了一般的、政治的进程的一部分。这就是社会民主主义的诞生。”“雷蒙·阿隆的世界是一个供给的世界；在它发生各种冲突时，所涉及的是多得一些，或少得一些，然而并非是要么得到一切，要么什么也没有。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在代表这种大的意见一致的政党中，哪一个政党，从根本上讲，并不十分重要。”（同上，第101-102页，第146页）

对于这些明目张胆曲解了马克思主义而又在当代西方以至世界上广为流传的话语，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毫无疑问，在马克思看来，没有谁（包括任何阶级、政党、个人）是天生的革命者或领导者，只有在领导群众不断进行胜利的斗争中才能实现领导权；没有谁（含任何阶级、政党、个人）具有天然的免疫力，面对权力可以自发做到拒腐蚀、永不沾，而只有不断地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才能保持先进性。就此而言，确实没有一个特殊的阶级、一个特殊的政党。但是，谁也不能否认，站在不同的阶级利益立场，对于社会问题的真理性认识和实践态度具有决定性意义；谁也不能否认，不形成特殊的既得利益（其根源是生产资料私人占有）是在改造客观世界过程中能够自觉改造主观世界的前提；谁也不会否认，任何阶级的群体，其自发的日常意识及其表现和本阶级的阶级意识及其追求总是不会直接等同的；谁也不能否认，



在当今世界，推动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的力量分布仍然是不均衡的，仍然存在动力和阻力、先进和后进的分野。由此看来，马克思主义关于先进阶级和先进政党的观点就仍然具有生命力。

西方上述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否定，在一定意义上说，也对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今天，我们不仅要透彻阐明什么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还必须阐明为什么这些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更为重要的是，还要着重阐明这些基本原理为什么正确，为什么在今天还仍然适用。我们现在对于许多重大问题的讨论，已经不存在共同的前提，因此讨论首先是前提的讨论。我们过去的论证往往止步于“经典作家是这样说的，他们这样说是根据的”，而现在的争论则要求我们进一步阐明“在今天该怎么说”。这就不是仅就理论本身就能加以说明的，而必须结合新的实践和新的历史条件进行创新研究。这是我们的努力方向。

### 三

中国的改革开放，从一开始就是一条崭新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它虽然是在毛泽东等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开拓的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的新探索，却不是原先道路的简单重复，更不是照搬任何现成社会主义模式。至于对资本主义的学习借鉴，对于我们而言，从来就不是从道路和发展方向的意义上说的。这就是邓小平所说的决不走“回头路”（即不回到任何以往的社会主义实践方式上）和决不走“邪路”（即不照搬西方、搞“全盘西化”）的实质。这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拓过程，就必然是不断地排除“左”和右的错误干扰的过程。的确，我们必须认识到，“左”始终是干扰改革开放的一大障碍；但是，由于西方在当代世界的优势地位和西化、分化我国的图谋始终存在，力图把改革开放引向资本主义化的倾向也始终存在。因此，邓小平指出：“解放思想，也是既要反‘左’，又要反右。三中全会提出解放思想，是针对‘两个凡是’的，重点是纠正‘左’的错误。后来又出现右的倾向，那当然也要纠正。”（《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29页）今天和小平提出解放思想时相比，“左”和右的表现都更具典型性。恩格斯曾说过“两极相通”，历史一再印证了这点。“左”和右都

惊人地一致把以改革开放为特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视为搞资本主义，都极其相似地割裂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今天讲坚持改革开放、继续解放思想，同样也要既反“左”，又反右，同样要做具体分析。

毫无疑义，由于时代主题和历史条件的变化，原先那种封闭起来搞社会主义的道路已经是一条死路，社会主义只有在改革开放中才能闯出一条活路。从这个意义上说，以改革开放为特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全新的探索，其创新性无论怎么估计都不为过。但是，通过改革开放搞社会主义，其前提是不走资本主义道路，不与资本主义趋同。因此，以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以共产党的领导和新中国成立后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为基础，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1985年，邓小平对中国的改革作了一个结论性的判断，这就是“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的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2页），所以堪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他同时非常鲜明地指出：“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开放政策，同时也要求刹住自由化的风，这是相互关联的问题。不刹住这股风，就不能实行开放政策。要搞四个现代化，要实行开放政策，就不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自由化的思想前几年有，现在也有，不仅社会上有，我们共产党内也有。”（同上，第124页）正是在这一基础上，我们党提出了要区分两种改革开放观的问题。“要划清两种改革开放观，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改革开放，同资产阶级自由化主张的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化的‘改革开放’的根本界限。”

因此，我们必须明确，中国的改革是在基本制度不变前提下的变革，是对国家政治制度 and 经济制度的不断完善。在改革开放的全过程，都必须加强和完善党的领导。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落实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其落脚点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离开了这一点，一切就无从谈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不断发展，必将越来越充分地展示出科学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和真理性光辉。

（作者：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